

走近甲午

QI

QI

ZHANG

ZHU

戚其章 著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走近甲午

ZOU JIN JIA WU • QI QI ZHANG ZHU

戚其章 著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近甲午/戚其章著. --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
2006.1

ISBN 7 - 80696 - 236 - 0

I. 走... II. 戚... III. 中日甲午战争(1894 ~ 189
5)--研究 IV. K256.3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9713 号

走 近 甲 午

戚其章/著

出版人/刘文君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)

<http://www.tjgcb.net>

E-mail: tjgcbcs@yahoo.com.cn

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8.625 插页 2 字数 49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2000

ISBN 7 - 80696 - 236 - 0

定 价: 38.00 元

前言

20世纪50年代后期,我研究历史的兴趣从中国古代史转到中国近代史,与开始对甲午战争史产生兴趣有极大的关系。将近半个世纪以来,我在甲午战争史研究方面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,也出版过几本书,但从来没想到要写一本像本书这样的著作。这两年我就考虑,年事已高,应该就此搁笔,向陪伴我几十年的甲午战争研究工作告别了。没有想写的书为什么写起来了呢?这不能不说到天津古籍出版社的蔡世华先生。蔡先生是我的忘年交,也是学术界长期保持联系的老熟人之一。2002年11月的一天,他打来电话,向我提出建议说:“我们最近出版了北京大学林华国教授的《历史的真相——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》一书,此书肯定对历史的教学和研究都会有帮助。你研究甲午战争几十年,能否也写一本关于甲午战争的书?”事情来得非常突然,毫无思想准备,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。答应吧,本来准备搁笔的,而且心中无数;回绝吧,又觉得对不起朋友。只好暂留回旋余地,答以再商量。

不想天津古籍出版社是十分认真的,2003年2月我赴京参加“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座谈会”,到宾馆报到,刚进房间不久,世华便陪同任世江先生从天津赶来相见,还是谈写作这本书的事。他们的诚意使我深受感动。交谈中,他们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:“你研究甲午战争几十年,可以把你的研究心得总结一下,借此展示出来。”但一时还是下不了决心,只是答应继续考虑。直到5月,

经过多次在电话里交换意见和讨论,此事才最终定了下来。

其实,在这半年的时间里,我也在不断地思考这本书的写作问题。最后确定书名为《走近甲午》,是与个人的研究经历有关。我研究甲午战争快 50 年了,这个过程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:一是从局部探索到全面推进;二是从略通门径到渐入堂奥;三是从描述历史到反思历史。所以,用“走近”两个字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我所走过的研究之路。既然是要总结几十年的历史心得,在体例上也就不采取一般专史的面面俱到的写法,而是以现在通行的章节体形式,将有关甲午战争研究中的学术前沿问题纳入到各章节之中,较好地个人长期研究心得展现出来。

所谓“学术前沿问题”指的是什么?在这里,主要是指以下几类问题:

其一,是引起争论的热点问题。这类问题在本书中占有相当的篇幅。有不少问题的争论是长期的,而且是时有反复的。如对方伯谦的评价问题即是如此。众所周知,方伯谦是甲午黄海之战的逃将。早在方伯谦死后不久,有署名“冤海述闻客”者,撰《冤海述闻》一书,为方氏鸣冤。然而,研究者对其书所述之真实性大都持怀疑的态度。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,即不断有论者试图根据《冤海述闻》来为方氏翻案,但响应者寥寥无几。到 80 年代,又有论者发现了广甲舰管轮卢毓英的《卢氏甲午前后杂记》稿本,断定是不可多得的甲午海战资料,学术界也有一些人信之不疑,特别是方氏后裔也参加讨论,从而刮起了一股为方氏翻案的旋风。然经过认真考辨,发现《卢氏甲午前后杂记》的史料价值不高,并不能视之为信史。目前这个讨论还在继续之中。

其二,是对国外某些需要商榷的观点问题。如日本侵略军攻占旅顺后,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惨案,这本是铁的历史事实,然近年却有日本学者撰文为之翻案,不顾包括西方记者在内的
大量目击者的报道和证言,从旅顺屠杀的背景,以及遇害者的身份

和人数入手,断言旅顺屠杀是被夸大了的,中国方面的死者数字比实际数字高出近10倍。这一观点能否成立?旅顺大屠杀的真相究竟如何?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。因此,有必要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,根据当年日本参战者和当事人的记述,对此混淆是非的观点加以商榷。

其三,是由于新资料发现而需要对某些历史事实重新认识的问题。如《马关条约》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;还订有《另约》,规定日本在威海卫的驻军费由中国支付,每年库平银50万两(共付3年);其后又签订《辽南条约》,规定中国再向日本支付赎回费库平银3000万两。对此,从来无人提出过问题。近年从翁同龢家藏文献中发现了日本驻华公使林董的一批信函,说明问题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了。根据林董的信函知道,日本要求中国交付赔款的两项办法:一是以“库平足色”为名,由日方定库平成分标准,变相地多勒索库平银1325万两;二是要求中国用英镑在伦敦支付赔款,也由日方定镑银折价标准,又多勒索了库平银1494万两。这样,中国的实际赔款数就不是人们所熟知的2.3150亿两了,而是2.5969亿两了。

其四,是对研究中提出的某些伪命题必须加以澄清的问题。如在日本学术界,称“‘陆奥外交’是和平主义外交”的说法,颇为流行,见诸不少有关日清战争的著作。这一提法,明显地影响到对甲午战争性质的正确判断,也必然会起误导读者的作用。其实,这不过是一个伪命题,因为它既得不到有力论据的支持,更经不起严格的历史事实的检验,所以是难以成立的。而这又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历史问题,不加以澄清是不行的。

总之,我写作此书的一个目的,就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此书,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对甲午战争的了解,而且能够开拓思路,认识到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中不只是有深刻的教训,也有十分宝贵而值得总结的经验,以期真正做到以史为鉴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甲午战前日本的侵华准备·····	1
一 侵华图谋由来已久·····	1
二 大力扩军与制订“征清”方策·····	8
三 “和平外交”还是开战外交·····	19
第二章 远东国际形势与日本的外交策略·····	35
一 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·····	35
二 日本挑起战端的外交策略·····	57
第三章 丰岛海战·····	73
一 丰岛海战史实辨正·····	73
(一)丰岛海战是谁挑起的?·····	73
(二)丰岛海战打了多长时间?·····	78
(三)日舰丰岛袭击得逞原因何在?·····	84
二 高升号事件及其赔偿问题·····	93
(一)高升号被击沉经过·····	93
(二)英日外交风波与高升号的赔偿·····	103
三 应该如何估价丰岛海战及其影响?·····	131
四 甲午战争开战时间究在何时?·····	143
第四章 黄海海战·····	163
一 黄海海战的经过及其结局·····	163
(一)海战的序幕·····	163

(二)海战的经过及其结局	175
(三)关于北洋舰队布阵及其得失问题	195
二 重新评价刘步蟾问题	211
(一)重新评价刘步蟾的来龙去脉	211
(二)刘步蟾是否有在黄海海战中怯战和战后冒功之事?	216
三 方伯谦被杀是否冤案问题	236
(一)“方案”引起的学术之争	236
(二)为方氏鸣冤之第一声	
——《冤海述闻》是怎样一本书?	256
(三)《卢氏甲午前后杂记》是否具有“极高的史料价值”?	275
(四)史料辨正与正确评价方伯谦	280
第五章 威海之役与北洋舰队覆没	295
一 威海基地保卫战及其失败原因	295
二 关于丁汝昌身世及自杀之谜	311
(一)探访丁汝昌身世之谜	311
(二)解开丁汝昌之死的谜团	322
三 从近代海防思想发展看北洋舰队的结局	333
第六章 平壤之役与辽东之战	349
一 平壤攻防战与清军溃围	349
二 辽东诸役清军战绩析论	367
(一)百战不挠的毅军	367
(二)辽阳东路争夺战中的聂士成和依克唐阿	372
(三)拱卫军与土城子伏击战	378
(四)辽东诸役清军得失论	381
三 辽东战局与帝后党争的发展和激化	389
第七章 日军的暴行和掠夺	410
一 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	410
二 旅顺大屠杀惨案的真相	421
(一)西方人眼中的旅顺大屠杀	421

(二)《在龙旗下》是怎样一部书?	437
(三)有关旅顺大屠杀的若干问题	443
三 日本的战争索赔和掠夺	457
(一)日本军费支出与中国实付赔款考实	457
(二)赔款以外的掠夺	472
第八章 抗日保台运动	477
一 关于乙未割台的历史背景	477
二 台湾民主国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	499
三 丘逢甲与抗日保台运动	512
(一)丘逢甲抗日保台事迹考	512
(二)为丘逢甲辩诬	526
附 录 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	541

第一章 甲午战前日本的侵华准备

一 侵华图谋由来已久

日本之发动甲午战争,就其侵略思想渊源而言,最早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。战争爆发后,日本当局开动宣传机器,煽动战争狂热,当时着力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位历史人物,就是丰臣秀吉。1894年创办的《日清战争实记》,从第3编开始连载坪谷水哉的《丰公朝鲜军记》,其小序开门见山地说:“我帝国开辟以来,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,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,迄于天智天皇在位,前后460余年间,凡30余次,然征讨三韩之地,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,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,当时则从未有过。天智朝以来的1220余年间,我兵出国征讨,大收宣扬国威之效者,仅有两次:其一,是文禄、庆长之际丰太阁征韩之役;其二,是此次对清军的讨伐。”^①这里所说的“丰太阁”,就是丰臣秀吉。

丰臣秀吉(1536—1598),原在大名织田信长(1534—1582)部下为将,因屡建战功,渐受重用,于1573年被擢为大名。1582年,织田信长于京都被家臣明智光秀袭击而自杀。丰臣秀吉遂代之以而起,于1585年任关白,1586年任太政大臣。1590年,丰臣秀吉统一全国。翌年,将关白职让与养子秀次(1568—1595),自称太阁。早在1577年,他就表露过要“率军进入朝鲜,席卷明朝四百余州,

^① 《日清战争实记》,东京博文馆,1894年,第3编,55~56页。

以为皇国之版图”^①。已经萌发了假道朝鲜入侵中国的海外扩张思想。

从1592年开始,丰臣秀吉先后两次大规模派兵进攻朝鲜,前后历时近7年。是年夏,侵朝日军连陷京城、平壤,并俘临海君、顺和君两王子。朝鲜大片国土遭到日军蹂躏。一时的军事胜利,使丰臣秀吉更加得意忘形,其侵略狂想也达到了极端。此前不久,他草拟了一份《二十五条觉书》交给关白秀次,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企图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。试看下列几点:

(一)令丰臣秀次于翌年占领北京,将大明之关白授予秀次,领有北京周围百县。

(二)准备于后年迁都北京,恭请天皇行幸明都,呈献都城周围百县供天皇“御用”。诸公卿将予采邑。其中下位者将增百倍,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。

(三)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亲王或八条宫亲王继之;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、备前宰相二人中择一人任之。

(四)朝鲜国由岐阜宰相或备前宰相秀家统治。

(五)秀吉居日本船来泊之宁波府,并进而占领印度。^②

丰臣秀吉的侵略计划并未如愿以偿。战事的失利使他忧忿成疾,终至不治。但以他穷兵黩武、大兴无名之师之举,称他为日本倡导大陆扩张的鼻祖,应是当之无愧。其流毒是极为深远的。

到德川幕府时期,鼓吹海外扩张者颇不乏人。其中以佐藤信渊最为典型。佐藤信渊(1769—1850),是江户后期的改革思想家,著有《经济要略》、《宇内混同秘策》、《吞海肇基论》、《防海余论》等

① 日本参谋本部编:《日本战史》,朝鲜战役,村田书店,1978年,11页。

② 《丰臣太阁御书事》,《新订大日本历史集成》卷3,1184~1185页。参见水野明:《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检证》,臧其章、王如绘主编:《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》,人民出版社,1995年,270~271页。

多种。其中,以 1823 年所写的《宇内混同秘策》一书最令世人注目,宣称:“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,为世界各国之根本。”根据这一狂言谬说,他认为,“皇国”“合并世界各国”和“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”,是不言而喻的^①。不过,他又指出,“合并世界各国”,不能不讲究方略,“故此书先详述略取中国之方略”。其故安在?盖“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,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”。而征服中国,必先取满洲。因为“凡经略异邦之方法,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。当今之世界万国中,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,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。”故征服满洲,“不仅在取得满洲,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”。并建议:日本天皇亲征,“取南京应天府,定为假皇宫”。在他看来,只要征服了中国,世界各国必纷纷来归。“中国既入版图,其他西域、暹罗、印度诸国,侏离缺舌、衣冠诡异之徒,渐慕德畏威,必稽颡匍匐,隶为臣仆。”^② 佐藤信渊的“宇内混同”论后来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海外扩张计划的“原型”,他本人的思想和主张则是名副其实的“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先驱”^③。

到幕末时期,随着攘夷与开国之争的发展,“征韩”的声调普遍地高涨起来。当时的学者也好,志士也好,“海外雄飞”^④ 已经成为他们的口头禅。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、胜海舟等。

吉田松阴(1830—1859),是幕末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。伊藤博文、山县有朋等人皆出其门下。1853 年,美国总统费尔蒙(M. Fillmore)派印度舰队司令培理(M. C. Perry)率舰驶进江户湾浦贺,要求日本开国,并威胁说:“若不受理,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,否则万一开战,美国必胜,那时可执白旗来见。”^⑤ 沙

① 井上清:《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》,人民出版社,1984 年,2 页。

② 水野明:《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检证》。《甲午战争与中国和世界》,272 页。

③ 大畑笃四郎:《日本外交政策史の展开》,成文堂,1983 年,105 页注(11)。

④ 大畑笃四郎:《日本外交政策史の展开》,71 页。

⑤ 吴廷彦主编:《日本史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,1997 年,315 页。

俄闻讯,亦派海军中将璞查廷(E. V. Putyatin)率舰来日,要求划定国界并通商。翌年3月,日本与美国签订《神奈川条约》,12月与俄国缔结《日俄亲善条约》。于是,日本被迫开国,锁国政策瓦解。吉田松阴认为,这虽是日本的失机,然尚可亡羊补牢。他说:“癸丑(1853年)、甲寅(1854年)一大机会也,乃坐失之。然事已往矣。为今之计,以亲善而制两虏,乘隙富国强兵,开拓虾夷,夺取满洲,占领朝鲜,合并南地(引者按:指东南亚),然后挫美折欧,则事无不克。前者失机,尚未足深惜也。”^①并主张:“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,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,便可开拓虾夷,封立诸侯,乘隙夺取堪察加、鄂霍次克海,晓谕琉球,使之会同朝觐,一如内地诸侯。且令朝鲜,纳人质,进朝贡,一如古时强盛之时。北割满洲之地,南收台、吕宋诸岛,以示渐进之势。”还在寄给其兄的一封信中称:“我与俄、美媾和,既成定局,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,以失信于夷狄。但必须严订章程,敦厚信义,在此期间养蓄国力,割据易取之朝鲜、满洲和中国,在贸易上失于俄、美者,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。”^②吉田松阴所主张的“补偿”论,正是日本近代喧嚣一时的“征韩论”的先声。

继吉田松阴之后,胜海舟可称得上宣扬“征韩论”的急先锋。胜海舟(1823—1899),是幕末和明治初期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。据《海舟日记》1863年4月2日记,他对桂小五郎(木户孝允)说:“现在应由我国派出船舰,向亚洲各国君子游说合纵连横,共同壮大海军,互通有无,研究学术,免受西洋的蹂躏。应首先说服邻国朝鲜,其次是中国。”问题是:他所说的“说服”到底是什么意思?其后,他多次在日记中谈“征韩”之事,如记他向人“解说征韩之深义”,因响

① 信夫清三郎:《日本政治史》,卷1,上海译文出版社,1982年,230页。

② 吉田常吉、藤田省三等校注:《日本思想大系》,卷54,岩波书店,1978年,193页。

应者寡，不禁失望地说：“征韩之议，因循不决，叹息时机之将失。”^①可是他所谓的“说服”，正是“征服”的同义语。翌年任幕府军舰奉行。他曾提出一个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：把日本全国分为江户、大阪和沿海六海域，共有蒸汽护卫舰 45 艘，蒸汽巡洋舰 135 艘，小型蒸汽船 190 艘，运输船和其他船只 75 艘，船员 64955 人。并指出：“如确立全国之守备，虽一二大藩自造军舰守卫本藩，然大权集中于国家之手，则纪律整齐，号令一致，足可退而守国内，进而攻敌国，终成东海一大强国，与西洋各夷争天下之要冲，亦不难也。”^②

到明治初年，最早再次倡导“征韩论”者则是木户孝允。木户孝允(1833—1877)，长州藩士出身，本名孝允，幼时入嗣桂九郎兵卫为养子，通称小五郎，与西乡隆盛、大久保利通并称为“维新三杰”。他曾不断鼓吹“征韩”之说。他在 1869 年元旦写道：

海陆两军于朝廷已稍具端倪，希望专以朝廷之力，主要以兵力开辟韩地釜山。如欲兴皇国于他日，维持万世，除此以外，别无他策。……韩地之事乃皇国建立国体之处，推广今日宇内之条理故也。愚意如为东海生辉，应从此地始。倘一旦动起干戈，不必急于求成，大致规定年年入侵，得一地后，要好自确立今后策略，竭尽全力，不倦经营，不出两三年，天地必将为之一变。如行之有效，万世不拔之皇基将愈益巩固矣。^③

可见，木户主张“征韩”，是想以此作为向大陆扩张的侵略基地。按：木户孝允虽在明治初年最早倡导“征韩论”，但在“征韩论”之争中却成为缓征派的一个代表人物。其后，外务大丞柳原宗光也认为：

① 井上清：《日本军国主义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5 年，第 2 册，8 页。

② 信夫清三郎：《日本政治史》卷 1，284、285 页。

③ 井上清：《日本军国主义》，第 2 册，53～54 页。

皇国乃是绝海之一大孤岛,此后纵令拥有相应之兵备,而保周围环海之大地于万世始终,与各国并立,弘张国威,乃最大难事。然朝鲜国为北连满洲,西连靺清之地,使之绥服,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,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。若使他国先鞭,则国事于此休矣。^①

表明他十分赞同木户孝允的见解。

1869年12月,日本政府采纳木户孝允的建议,决定向朝鲜派遣使者,实际上是为武装侵略作准备。木户所赏识的久留米藩士佐田白茅,是一个激烈的“征韩论”者,因而成为理想的使者人选。佐田白茅调查后回国,提出了自己对韩方策的建议书。其主要内容如下:

(一)朝鲜有必伐之罪,不愁找不到借口。“曩天朝下一新之书,文官皆曰:宜从结交答之。武官皆曰:结交则日本终以我为藩属,须排斥其书。国王采武官之说,以有不逊之文字摈却之。呜呼!其摈却之,是朝鲜辱皇国也,皇国岂可不下皇使以问其罪乎哉?朝鲜知守不知攻,知己不知彼,其人深沉狡狴,固陋傲顽,觉之不觉,激之不激,非断然以兵莅之,则必不为我用也。况朝鲜蔑视皇国,谓文字有不逊,以与耻辱于皇国,君辱臣死,实不共戴天之仇也,必不可不伐之。不伐之,则皇威不立也,非臣子也。”

(二)伐朝必胜无疑。“大兵直入,其一大将率十大队,向江华府,直攻王城;其一少将率六大队,进自庆尚、全罗、忠清三道;其一少将率四大队,进自江原、京畿;其一少将率十大队,溯鸭绿江,自咸镜、平安、黄海三道而进。远近相待,缓急相应,角之犄之,必可不出五旬而虏其国王矣。”

(三)伐朝可并清而伐。“当天朝加兵之日,则遣使于清国,告以伐朝鲜之故;若清必出援兵,则可并清而伐之。”

^① 日本外务省编:《日本外交文书》,卷3,1938年,149页。

(四)既可防列国对朝鲜之覬覦,又是实行海外扩张的大好机会。“全皇国为一大城,则若虾夷、吕宋、台湾、满清、朝鲜,皆皇国之屏藩也。虾夷业已从事开拓,满清可交,朝鲜可伐,吕宋、台湾可唾手而得矣。且夫朝鲜之所以不可不伐者,则尤有故:四年前,法国攻朝鲜,取败衄,懊恨无限,必不使朝鲜长久矣。又俄国窃窥其动静,美国亦有攻伐之志。皇国若失斯好机会,而与之于外国,则实失我唇,而我齿必寒。”

(五)伐朝鲜有百利,乃富国强兵之道。“伐朝鲜有利而无损,一日虽投若干金谷,不出五旬而得其偿矣。今大藏省每岁出金凡二十万元于虾夷,未知几年而成开拓矣?朝鲜则金穴也,米麦亦颇多,一举拔之,征其人民与金谷,以用之于虾夷,则大藏省不惟取其偿,省数年间开拓之费,其利害岂不浩乎?故伐朝鲜者,富国强兵之策,不可轻以糜财蠹国论却之也。”

(六)借外征以消弭内乱之隐患。“今皇国实患兵之多,而不患兵之少。诸方兵士,以东北之师为最足,颇好战斗,翘足思乱,或恐酿成私斗内乱之忧,幸有朝鲜之举,用之于斯,以泄其兵士郁勃之气,则不惟一举屠朝鲜,大练我兵制,又大辉皇威于海外,岂可因循苟待,而不神速伐之乎?”^①

佐田白茅的建白书说得头头是道,“理由”也显得更为充分。但正如论者所说:“这个建白书,完全是黠武主义的狂论。他要屠朝鲜,伐中国,并括吕宋和我台湾为己有,一派武力征服的论调。不过,这篇‘征韩论’的代表作也透露了当时日本国内的一种情况,就是讨幕废藩之后,一群骄兵悍将蠢蠢欲动,对外用兵,可以潜消内乱,即所谓‘攘外以安内’,这是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一贯使用的侵略政策。”^②

① 王芸生: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,第1卷,三联书店,1979年,116~118页。

② 王芸生: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,第1卷,118页。

由此而在日本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“征韩”问题的激烈争论。“征韩论”之争的具体表现,先是为出兵与反对出兵之争,后则为遣使与反对遣使之争。将此归结为征韩派与反征韩派之争,是不正确的。因为“征韩论”的实质,应是征服大陆论。在这个大原则问题上,争论的双方并未表示异议,其主要分歧是在策略方面,即急征还是缓征的问题而已。

1884年,日本利用中法战争之机,支持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,企图建立亲日傀儡政权,从而以朝鲜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。但是,这次政变遭到了失败,日本未能如愿以偿。于是,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华浊浪。如曾是日本幕末、明治初年杰出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(1834—1901),这时已堕落成极端的国权论者,便公开鼓吹诉诸武力,乘此次事变之机,“干涉朝鲜内政,努力实行吞并”,以使日本成为“东方之盟主”。并献策说:“与中国之纠纷,乃吾等为国家所最希望者也。”^①此正合日本当政者的心意。从此,日本政府便举全力以进行大陆作战的准备。

二 大力扩军与制订“征清”方策

日本要进行大陆作战,发展海军为必不可少之举。天皇睦仁登基不久,即发布谕令:“海军为当今第一急务,务必从速建立基础。”^②当时日本海军兵船不过10艘,皆渺乎小舰,无足道者,故有此谕令。到1872年,隶于海军省的军舰共14艘,总吨位不过18000多吨。日本有了这样一支不大的军舰,就准备派出海外进行军事冒险。1874年日军侵台失败,日本政府深感舰船之不足,便向英国订造了扶桑(3000吨级)、金刚、比睿(皆2000吨级)三艘

① 远山茂树:《日本近现代史》,第1卷,商务印书馆,1983年,76~77页。

② 内田丈一郎:《海军辞典》,东京弘道馆,1943年,1页。